

开开经济学家的

玩笑

JOKING



林行止
著

经济学有用吗？

经济学家可信吗？

香港《信报》创始人 “香江第一健笔” 林行止

开开经济学家的玩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开开经济学家的

玩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开经济学家的玩笑/林行止著.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599 - 7

I. ①开… II. ①林…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419 号

责任编辑 陈 雷
美术编辑 甘晓培
封面装帧 王泽元

开开经济学家的玩笑

林行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599 - 7/F · 2094

定价 22.00 元

目录

CONTENTS

著作不辍的葛尔布莱斯	1
凯恩斯后第一人	5
《经济学名人录》与张五常	9
焚烧手稿的亚当·斯密	13
孟格创唯心经济学	19
佛利民看字 凯恩斯相手	25
开开经济学家的玩笑	29
戴力陶精而不简……单!	33
纳殊港大讲学	37
解颐广财路 幽默登殿堂	41
延年讲笑话 益寿乐安康	45
测市容易赚钱难	51
莫道长“揸”短炒计实惠	55
可有理性投资?	59
智慧、时机与本钱	63
“吼”价“计”息“秤”市	67
随机应变谋进益	71
传统智慧与理性推敲	75
股市没有先知	79
凯恩斯开眼炒股	83

并非人人经济人	89
经济学不能用世	95
经济学设奖 诺贝尔蒙污	99
复核统计探真伪	103
生态平衡今胜昔	107
灯塔震撼象牙塔	111
一杯伴读博雅风流	115
观“衣”察“饰”零售智慧	121
盛衰东西望 利害定去从	125
熊彼德潇洒治学	129
“三位一体”论垂之久远	145
证实广告减低货价非虚妄	149
逆行者、火中栗、腰间钱	153
经济学家与藏书	159
半途学经济成大业	171
荷兰人委“曲”——郁金香	175
花都居 大不易	185
拜别华尔街告别众香国	189
“宅经济”与自闭潜力	193
圆周奥秘投资必杀技	201

著作不辍的葛尔布莱斯

加裔美籍经济学家葛尔布莱斯(J. K. Galbraith)向为学院式经济学家所轻视,说他写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通俗经济学,他从未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期的《信报月刊》显然摆了乌龙。

在只差三个月便九十一岁的耄耋之年,葛尔布莱斯7月间欣然飞赴英国,接受伦敦经济学院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演词《二十世纪未了之事》,轻松幽默,含义甚深,正如《信报月刊》编者所言,是“小中见大,极具睿智”;这篇短文值得大家细读。

葛尔布莱斯向来致力于拉近贫富的研究,但他并非要以行政手段达成此目的,更没有把富裕阶级打入地狱的想法,而是主张“我们既接受富人享受闲暇,也应接受穷人享受某种舒适”。这种看法大为“良知中产阶级”认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亦不反对,也许这是他至今仍到处受欢迎的原因。

葛尔布莱斯“回顾本世纪的成就,殖民主义的结束堪值庆贺;不过,太常见的情况是,殖民统治完结,有效率的政府也随之不复存”。他心中所指的是非洲国家,香港特区政府当然不必对号入座,但我们岂能不提高警惕?

葛尔布莱斯反对核武器竞争,由来已久,有次他对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谈论此问题,后者不耐烦地听了数分钟后,说:“你真幽默”便“拂袖”而去。事见葛尔布莱斯的《经济学、和平与笑声》一书。在这次伦敦演说结束前,他不忘指出“(二十世纪)人类另一未竟的大业是尚未能消灭核武器;核武器足以毁灭一切文明”。葛尔布莱斯并非象牙塔学者,但何以他不明白没有核武器,哪来和平?

葛尔布莱斯早从哈佛荣休,仍保留办公室,定期授课(相信是东拉西扯一类);他和已结缡六十二载的夫人住在占地二百五十公顷的农庄,每天写作三小时,四季不辍。他的 *Name-Dropping* 刚出版,相信内容如开酒会,必然十分热闹,因为他的一生确实多姿多彩,可记的人、事、物不少。

1937 年归化美国后,葛尔布莱斯便与哈佛大学和民主党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麦高文和总统肯尼迪及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克林顿和他较为疏远,但他亦曾赴小石城作客。葛尔布莱斯战时出任物价管制局局长,肯尼迪在位时出使印度,可说相知遍天下,这本新书必大有可观;现在他正着手撰写暂定名为 *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 的书。

加拿大著名时事杂志《麦克林》(数年前出中文版,现在未知如何了)十月号发表《和葛尔布莱斯午餐》的短文,贺其九秩晋一,写其简史、简介其学说,都是老生常谈,并无可记之处;他和记者闲聊了两个钟头后,突然打断话题,起身送客:“我们谈够了,我还要写作哩。”访问便结束。

葛尔布莱斯出了数十本书,最著名的当然是《富裕社会》和《新工业国》(两者出版时间相隔约十年,但它们有连贯性,可说

是一书两卷),均成经典,不过,近二三十年他的著作内容不断重复(在新内容中渗进大量旧东西),他有自知之明,请读者原谅:因为“写书是穷教授帮补家用的唯一办法”!

海伦·沙逊编辑的《朋友之间》(H. Sasson: *Between Friends*, Houghton Mifflin)出版,选进了十七篇友人(及儿子)谈论葛尔布莱斯“文章道德”的文章。

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两位“高人”相遇的对话。在肯尼迪丧礼后白宫的酒会上,身高六呎八吋(一说七吋)的葛尔布莱斯遇上六呎六吋高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后者对前者说:“颇出意外,竟然有人比我高!”又问:“我们和比我们矮的人有何分别?”葛尔布莱斯说:“第一,在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被认出;第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端庄正直,因为我们无从隐蔽!”据当时在场的墨西哥著名学者回忆,戴高乐对此回答极为欣赏。

葛尔布莱斯的大儿子彼德(1998年初撰文时任美国驻克罗地亚大使)所写一文,令人感动,亦是“民主教育始于家庭”的范例。彼德十岁时,父亲被肯尼迪总统委任为驻印度大使,这意味着他们全家得搬往印度。彼德为此老不大愿意,他既舍不得邻居、同学,对所豢养的宠物更是难分难舍,因此大闹“不去印度”的情绪。事实上,未成年的彼德除了乖乖听话,是无所选择的;不过,他父亲并不强迫他,而是施展“外交手段”,说此事“可以商量”,但彼德仍不为所动。

数天后,彼德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白宫的信,原来是肯尼迪总统用总统府信笺亲自给他写信,除了备述印度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极具吸引力的国家,又回忆乃父出任驻英大使时他们一班兄弟姊妹的乡愁、忧虑很快消失的情况,肯尼迪还说驻外大使

的儿子可当少年和平工作队员(Junior Peace Corp),“协助你的双亲和国家”。肯尼迪签名后,还写上一行“又及”：“我希望也能去印度。”不消说,小彼德被“软化”了。

此事发生三十二年后,彼德自己当上大使,他父亲的忠告只有一句:“控制你的通讯。”这是葛尔布莱斯在印度大使任内的经验——特别是中情局的通讯,大使非亲自处理不可。

葛尔布莱斯虽不肯把当大使的“秘诀”传子,但彼德耳濡目染,了解他父亲视大使为清闲的工作;这从在二十九个月任内,葛尔布莱斯一共写了五本书(包括半自传体小说《苏格兰人》——三本写于任内,两本利用任内收集的资料于离任后出版)可见。不过,彼德可没乃父当大使时清闲,除了巴尔干半岛乱糟糟外,对付中情局的“小报告”,亦令他忙得不可开交。

(1999年10月6日)

凯恩斯后第一人

数天前写三十一届诺奖经济学奖得主蒙岱尔(R. Mundell, 1932—)的“怪行”，由于怪得甚为离谱而有关电讯只字不提，因此有点担心作出错误报道；昨天读报，才放下心头大石。蒙岱尔的确“古怪”，他的学生、MIT 著名教授唐布殊(R. Dornbusch)对《纽约时报》谈及乃师学术成就时，不忘说：“如果他(蒙岱尔)随口给你一组数字，千万别当真，因为这些数字可能是毫无所本信口冲出的。”这是蒙岱尔经常神不守舍的最佳写照。该报又说，1967 年至 1970 年蒙岱尔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兼任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学报》(JPE)编辑时，是芝大经济学系最“乱笼”的时代，教员休息室看来有点像矿区酒吧，饮酒和玩扑克，闹得乌烟瘴气。1971 年他“跳槽”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该校以收容众多“特立独行”学者知名)，不少芝大同事大快，认为“滑铁卢遇上拿破仑”，好戏在后头。

蒙岱尔从未有过做画家的念头，但有一个时期对绘画十分热衷，据他的信徒、七十年代《华尔街日报》社论作者温年斯基透露，蒙岱尔在 1974 年至 1975 年间，花十八个月画了四百多张色彩斑斓的油画，其画风像“梵高野性大发”；梵高本是疯子，野性

大发,可见这些画之“触目惊心”了。

上蒙岱尔的网址,希望看看他对得奖的反应,哪知毫无动静;妙的是其网址只有两页,第一页是他一岁大的孩子爬地的相片,第二页列出他的职位及四类著作,如此而已。此孩子为第二任夫人所出;他与和他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现年四十岁)的第一任太太在 1972 年离婚。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蒙岱尔预见通胀快将肆虐,于是购入“地上资产”以保值,但他买的是在意大利中部名城西恩那(Siena)附近一座建于十六世纪的城堡(时在意大利讲学),经过近十年慢条斯理的装修,“已恢复文艺复兴的光彩”,该城堡成为他避暑度假之地,有时亦在那里举办暑期研讨会;这次得奖后,他说要把大部分奖金用于“美化”此城堡。

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院士陈昭南教授,在芝大念博士时,蒙岱尔是他的指导教授。昨天陈院士对台北《经济日报》说:“蒙岱尔(孟德尔)是传奇型、天才型的人物,上课时是公认一塌糊涂、随心所欲地教学,而且也不改考卷……但有时酒醉时的一句话,却可能成为学生论文的灵感来源。”

蒙岱尔这种“教学”方式,令笔者想起韦白龙(T. Veblen),这位以《有闲阶级论》而广为人知的制度学派开山祖师,此公吊儿郎当,对俗世的事欲理不理,唯对女性则兴趣甚大(最后因此去职),他说话口音不清,讲课不知所云,从不改卷,一律给 C 分!

笔者对诺奖遴选委员会在蒙岱尔的“赞词”中只字不提他对“供应方面经济学”的贡献,深以为异,亦担心“看漏了眼”;昨天《华尔街日报》亦持同一看法,可见吾道不孤。在一篇报道中指

诺奖委员会故意避开此一“政治问题”，只表彰他因提出最适货币区及研究不同汇价制度下的财政及货币制度应如何发挥功能有成而得奖，言下有颇不值该委员会所为之意。该报说，蒙岱尔的保守派友人则视其得奖，是“供应方面经济学”获得肯定的明证，如果不是他主张大幅减税，里根固不会当选、连任，美国经济亦无今日之繁荣。该报昨天社论题为《一个供应方面(经济学)诺贝尔奖》，可见较重视蒙岱尔在这方面的成就者大不乏人；这篇社论最后一段写道：“从推动实际政策层面看，蒙岱尔是凯恩斯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阿佛烈·诺贝尔 1895 年立下遗嘱(翌年便一命呜呼)，把遗产设立基金，每年提取收入的一半，分奖给在物理、化学、和平、文学和医学有特别成就的人；1901 年第一次颁奖，奖章因铸造不及，第二年才补送——奖章为二十三 K 黄金，重八盎司，一面铸上诺贝尔像，一面是拉丁成语：“人类的生活因你的发明而多姿多彩。”1968 年瑞典银行为纪念其创办三百周年，设立基金，颁年奖给经济学家，并与诺奖挂钩(由皇家瑞典科学院组成五人遴选委员)，而奖金全名定为“瑞典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奖金约百万美元；三十年来，有四十三名经济学家获奖(迄今女性无缘问津)，其中约三分之二为美国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遴选委员五人，分别来自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和 Uppsala 大学，他们是不同科目的教授。遴选过程是一年前要求世界各地被认为合格的经济学家(包括所有诺奖得主)提出“明年得奖者人选”，通常可收回四五百个提名，在一组委任的专家协助下，遴选委员会定出二十至三十名之间的人围名单，经过反复辩论，写上评语后，名单交给社

会科学研究所；如无问题，候选人名单于夏末初秋送交皇家科学院，由全体院士投票表决（简单多数票制），得票数多者成为得奖者，消息于10月中旬公布。

诺奖得主遴选过程以保守秘密出名，据说1993年得主诺斯（D. C. North, 1920—）10月初已接德国传媒道贺，但当时诺斯确无所知，得奖后他问有关当局消息如何泄露，获告以“纯属揣测之词，本委员会消息绝对不会外泄”。

《纽约时报》经济学通讯员纳塞女士，去年出版题为《至美心境》（S. Nasar: *A Beautiful Mind*, Touchstone, 1998）一书，是1994年诺奖三位得主之一纳殊（J. F. Nash）的传记。纳殊有“普林斯顿游魂”之称，皆因他研究数学走火入魔，经常恍恍惚惚、疯疯癫癫，诺奖仍颁给他，引起作传者发掘内幕的兴趣，她为此专程赴斯德哥尔摩作一周的采访，写成“最难写的一章”（第四十八章：《大奖》），但并无所发现，只是作者觉察公布纳殊等得奖名单的时间比往年迟了一个半小时，据作者的揣测，这是科学院院士经过多轮投票后才取得共识有以致之。遴选所有诺奖得主过程的文件，五十年后才能公开，现在大家对这位精神失常学者何以得奖的原因，只有各自表述随意猜测了。

（1999年10月15日）

《经济学名人录》与张五常

《经济学名人录》(*Who's Who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已于去年底出版,和 1982 年初版比较,新书是“煌煌巨构”——初版四百三十五页,新版近一千二百四十页。

《名人录》编者 Mark Blaug(1927—),荷兰人,向在英国任教,已是两所大学的荣休教授,现在仍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教授;Blaug 的经济学著作不少,不过,笔者是从他编辑的几本工具书闻其名,除了《名人录》、《凯恩斯前经济学名家》及《凯恩斯后经济学名家》,均为涉猎经济学者手旁的必备书。

这部《名人录》值得推荐,以其把 1700 年至 1996 年间世界重要经济学家一网打尽。初版包括一千一百名经济学家,生死七四比;笔者没有 1986 年版,看新版的介绍,1986 年版已增加至一千四百名经济学家,其中千名在世、四百名去世;在世入选的评选标准以在 1972 年至 1983 年十二年内论文被引述次数多寡来衡量。经济学界特别注重论文被行家引述的情况,而所根据的是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该指数由费城的科学资讯学社(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编汇,自从 1966 年以来,每年三次公布指数,其经济论文指数撷取四十五

国为学界所重视的共约二百种学报、经济学书籍及讨论会论文的资料,绝对客观,极具权威性,可说是衡量经济学家在学界重要程度的最主要参考。

新版《名人录》包括那四百名过世的经济学家外,在世的则共一千一百名,入选标准是他们的论文在 1984 年至 1996 年间被引述次数最多(most frequently cited economists)。1986 年,估计世界在生的经济学家共一万七千人,第二版《名人录》收录的经济学家一千人,约为百分之六;在此后十三年,经济学家的人数倍增(以每年平均增幅百分之六计),令新版《名人录》的一千、一百位,只占全球经济学家百分之四! Blaug 因此说他在经济学界的“敌人”愈来愈多——不入围的都视之为“敌人”。

华裔学者入选的,真的寥寥可数。张五常(1935—)在第一版已入围,新版的内容基本未变,只是“出版”栏下加进了数本书名被译为英文的中文书,这部分据编者言是作者 D. I. Y 的; *A Tangerine Seller Speaks* (本报出版)当然列在其中,《卖橘者言》1983 年初版迄今已再版二十五六次,几乎三年二次“重刷”,诚属奇迹! 黄有光(1942—)则在 1986 年被选中。本报(和月刊)读者有幸,因为这二位声蜚国际的经济学家替我们一报一刊撰写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黄教授为马来西亚客家人,其姓名的英文拼音为 Yew-Kwong Ng,常被误为 Y. K. 吴,台湾的《经济学百科全书》便如是,其实在潮闽语言中,王黄读音迥异,吴更无论矣——吴在南洋多译为 Goh,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及前财政部长吴瑞庆。黄氏现任澳洲墨尔本莫纳什(Monash)大学私座经济学教授,为国际知名的福利经济学家,英文著作甚多,其成名作《福利经济学》早于 1979 年在英国出版

(1983年再版);黄氏中文近著有《经济与快乐》(台北茂昌图书,1999年5月;收录多篇在《信报月刊》发表的文章),替本书作序的是台大经济系教授熊秉元及北大的厉以宁教授,现在定期每周一次为本报撰稿。黄氏治学、写作甚勤,本行之外,尚写过一本渗透经济学的奇情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对诗词和对联亦大有研究。

曾多次接受本报访问的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邹至庄(1929—),亦在《经济学名人录》初版之中,只是当时收在“生于澳门”项下,但新版则属“生于中国”,澳门因此“除名”;尚幸张五常未“易地而生”。笔者以为这个乌龙是编者不小心所致,如果澳门回归令邹教授“改籍”,则张五常没有理由可以保留原籍。

中大、科大和港大有不少名学者,经常有论文在学报发表,大概是被引述次数不多而未上榜;不过,翻阅《名人录》,见有讲师、副教授亦榜上有名(当然是他们有论文被广泛引述),真要为香港学者抱不平了。以笔者的看法,最低限度,曾替《保尔格莱夫金融学辞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and Finance*)撰文的饶余庆(港大)和陈家强(科大),便不应成为遗珠,因为有专文刊于这部权威辞典上,显示对该方面学说有一定成就,而且所撰文章必为同业及评论者经常参考,没理由不能入《名人录》的。

张五常在4月27日《壹周刊》的“南窗集”三谈他写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作——“《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有一段提及杜玛(Evsey D. Domar, 1914—1998)说:“1966年12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E. Damar寄来的邀请信。”杜玛为俄国人,在东北长大,1930—1931年在哈尔滨大学法学院攻读,后赴美国。

杜玛写信给张氏时为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他因为和英国经济学家夏祿德(Roy F. Harrod, 1900—1975)共同发明(coinventor)经济成长理论〔经济学界称之为(Harrod-Domar Model)〕而享大名;应该一提的是,夏祿德和杜玛是各自研究的,前者是经济成长理论的先驱,后者的立论与前者略为不同,杜玛以达成充分就业所需的长期条件为研究目标,终于找寻出满足此条件的经济均衡成长率,这是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衍化而来。夏祿德和杜玛均为凯恩斯学派的大师级人物。

杜玛对张五常的论文十分欣赏,张氏之能赴芝大读一年博士后,可说完全是杜玛居中穿针引线之功。

张五常写及杜玛部分,点到即止,其实他们的交往,张氏不妨“和盘托出”。不久前读杜玛的论文结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农奴制》,中有一文《瞎子摸象:论主义》,在注三十三中提到美国体育赛事的门券定价问题,便说“供不应求令滥用权力的情况随处可见……门券价格不能配合需求,令决定门券该卖给谁的组织者可以以之作为和获配售门券者交换一些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杜玛接着注中加注,指出:“这是张五常的观察。”笔者多年前读过张氏一篇论 Rose Bowl 门券定价的短文(这篇短文没有列入《名人录》的出版栏下),他是否曾和杜玛讨论过这个问题?体育盛事的门券定价,其实与餐厅东主及 1997 年前的香港地产商保持“相对低价”(第一期楼花必比第二期廉宜)以吸引长龙、制造供不应求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氏写了多篇“经济学掌故”,不妨把他和杜玛这段“佳话”写出!

(2000 年 5 月 3 日)